

持续发酵的历史修正主义

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被建构、记忆和传承的，而历史教科书是最重要的传承历史记忆的媒介。顺此逻辑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。

近年来，日本当局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，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，掩盖历史真相，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，甚至系统性抹除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记忆。

这种伎俩由来已久，早在1982年，日本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时就严重歪曲历史；1985年，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，是战后40年来日本第一位在任首相以公职身份进行参拜。这些事件使得历史教科书、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更广泛层面的历史认知问题，开始成为东亚地区，尤其是中日、韩日之间的主要外交问题之一。

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是日本逐渐走出战败阴影、国力提升，民族自信心随之空前高涨。通过参拜靖国神社，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历史等操作，日本右翼试图修改和平宪法、以历史修正主义挑战“战后体制”和实现自我解绑等，改变战败国形象进而迈向政治大国。

对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蔓延的行径，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直言不讳地提出，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批判，就无法进行反省。首先要面对的问题，即“侵略”并不是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，而是作为历史事实如何认识的问题，其中还包括不重视历史、把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说成“不存在”的固定思维模式。

日本政府关于反省历史问题有三次重要谈话，即1982年的“宫泽谈话”、1993年的“河野谈话”以及1995年的“村山谈话”。山田朗以这三次谈话为切入点，深入剖析了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争议与挑战。他指出，这三次谈话核心围绕慰安妇问题、近代日本对外侵略和殖民地统治、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加入近邻诸国条款等争议展开，本应构成日本历史认识的基石，但在右翼政治力量推动下，其精神正被系统性侵蚀。

日本政界蔓延的历史修正主义，不仅试图抹去三次谈话的历史意义，还反映出其无视侵略和美化殖民统治的本质。距离战争结束太久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由于知识和构想力的不足，对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印象非常淡薄，反驳那些拥护和肯定战争及殖民统治的论调的力量也日渐变小。山田朗反思，作为史实的殖民统治、侵略战争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旧昭然，那些所谓的“不重视历史而得到的荣耀究竟是怎样的荣耀？在他看来，不基于事实的荣耀，不知道真正的历史和本国形象的荣耀，不过是自我吹嘘罢了。

丝毫没有对战争的反思

近30年来，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动向加速。右翼势力声称如实讲授日本侵略历史为“自虐史观”，部分出版社开始编写带有所谓“爱国主义”色彩的历史教科书。即使被视作比较公正、中肯的几家主流出版社，其记述内容亦存在对战争责任的刻意掩盖，极力描述本国受害与尽量简化对他国施害的巨大反差。一言以蔽之，即受害者意识和加害者反省的“置换”与对基本史实的“遮掩”乃其根本特质。

山田朗抽丝剥茧，将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四种：肯定战争；排斥外国、异民族；国家（天皇）中心思想；搁置战争性质，无条件地将牺牲神圣化。尤其是对靖国神社，山田朗特别指出，在其游就馆里，陈列着战死者的遗物，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那里只是一味地强调战死者的尊贵，丝毫没有对战争的反思。

与教科书相伴而生的，还有支撑历史修正主义的战争观，比如“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不唯日本”“战争和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”“战争为亚洲独立发挥了作用”“日本与英美迫不得已作战”“日本虽然举国但无领土野心”等等。

山田朗用思辨与史实结合的方式，一一驳斥了上述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。比如，有

历史倒车，终入深渊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近日，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了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，其中一些版本刻意淡化、否定乃至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，防卫省首次部署具有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”的远程导弹。这一连串的动作，是日本右翼势力数十年来系统性篡改历史记忆、毒化国民认知，最终服务于其国家战略野心的关键一环。

日本历史学者山田朗的《日本如何面对历史》一书，为我们穿透表象提供了滤镜，将这一开历史倒车的做法，置于“硬件（兵器及装备）—体制（法律体系和制度）—软件（价值观及战略）”的战略框架下审视，让我们看清其逻辑之严谨、图谋之深远、危害之巨大。

山田朗指出，日本历史教科书把错误的历史认知推向日本社会，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，助长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，也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。山田朗认为，以美国战略为基础，在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前提下，日本目前正在进行可能发动战争的体制制作，很明显硬件先行（兵器及装备），法律、制度和组织紧跟其后，然后再进行与之相对应的人才、价值和战略的创造。

一旦硬件先行，制度和战略要与之相应配备，最好的选择便是在新编撰的教科书里美化战争，创造出充分肯定战争价值观的年轻人。这正是“三要素”中担当战略创造的部分。



人主张让问题随时间付诸东流，既往不咎，“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来看过去”。对此，山田朗有着作为历史学家的清醒。在他看来，正确认识历史，不是为了把现代人带回过去。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，也不是盲目接受或认同过去的价值观，而是要搞清楚，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那样做？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条件、制度限制或思想局限？只有如此，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时，才能看到他们当时看不到的问题，以及长远的历史后果。这样，历史才不是简单地“复述故事”，而是既能理解过去，又能超越过去，让人从中获得真正的教训和智慧。

山田朗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无论教科书还是诸多荒谬的战争观，其意图是在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对于战争的否定，从而培养出新的战争价值观。随即，他提出一套逻辑结构，即国家要发动战争，需要硬件（兵器及装备）、体制（法律体系和制度）和软件（价值观及战略）三者齐全，即所谓的“战争遂行三要素”。这三要素的一般规定是按软件→体制→硬件（或软件→硬件）的方向递进。也就是说，以容忍战争的价值观为基础形成军事战略，根据这个战略构筑发动战争的体系和制度。有了这样的战略和制度后，再建设、置办兵器体系和装备。

事实证明，被毒化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把错误的历史认知推向日本社会，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，助长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，也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。山田朗认为，以美国战略为基础，在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前提下，日本目前正在进行可能发动战争的体制制作，很明显硬件先行（兵器及装备），法律、制度和组织紧跟其后，然后再进行与之相对应的人才、价值和战略的创造。

一旦硬件先行，制度和战略要与之相应配备，最好的选择便是在新编撰的教科书里美化战争，创造出充分肯定战争价值观的年轻人。这正是“三要素”中担当战略创造的部分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在日本国内，先行的硬件构筑、制度配备主要被军事专家、执政党政治家和财界所掌握。近日，日本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，防卫省首次部署具有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”的远程导弹，表明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已不只是危险苗头，而是现实威胁。这些动向不仅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，更可能将日本再度引向战争深渊。

主动参与战争责任的追究

在当今日本社会关于历史认识的激烈论争中，追究战争责任这一议题往往被误解为“向后看”的消极行为。然而，山田朗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，即追究战争责任“决不是向后看的工作”，而是“创造未来社会必要的、不可或缺的投资”。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历史反思的本质意义，令人信服。

日本若要与邻国重构友好关系，仅靠口头上的理念表达远远不够。真正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历史问题的妥善解决之上。保护历史记忆，防止历史被改写，铭记受害者，防止美化侵略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任务。只有通过解决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，尽可能消除各国各民族之间的隔阂，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。如果日本对历史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，不仅无法赢得邻国的信任，更将失去面向未来的道德基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追究战争责任是一项基础性工作，它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实力，更需要对历史真相的勇敢面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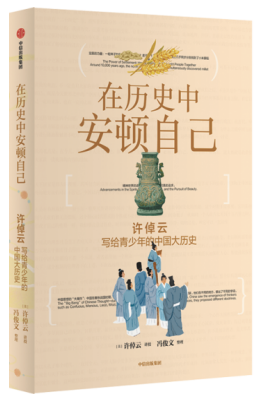
对战后出生、未曾经历战争的人们而言，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的侵略罪行？针对日本社会存在的让后人承担战争责任是“不近情理”的论调，山田朗有着不同的见解：正如享受着祖先留下的文化和经济遗产一样，对先人未曾清算的“负的遗产”，后人同样有责任参与清算。这种责任不是简单的“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就要谢罪”，而是通过主动参与战争责任的追究，亲自确认历史真相，从而真正完成承担历史责任的任务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在政界与网络上的加速蔓延，其“教育再生”政策的推行，试图培养民众“对日本抱有荣誉感”，将对国家、民族主义的批判视为“自虐性”举动。这种倾向实际上是选择性地看待历史。山田朗坚信，真正的历史观应该是全面而客观的。历史中既有光明也有阴影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。只有全部正视，才能从其中吸取教训，增长智慧。如果只挑选让自己感到舒适的部分进行放大，只会陷入自我满足的境地。

山田朗正视历史的呼声尤为重要。特别是在当前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背景下，这样的理性声音显得尤为珍贵。它提醒日本社会，真正的爱国主义绝不是盲目美化历史，反省国家与社会的失败绝不是“自虐”，而是面向未来的必要准备。随着右倾化的加剧，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认知再次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。毋庸置疑的是，开历史的倒车，终会落入深渊。殷鉴不远，究竟何去何从，考验着日本政治人士的政治勇气和历史良知。

读书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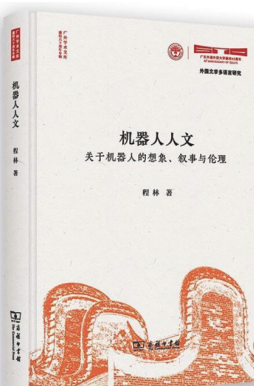
《在历史中安顿自己》
许倬云 著
中信出版集团
如今的孩子，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机遇也充满不确定的世界，他们需要的，不仅是课本上的知识，更是能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格局、定力与韧性。而大历史，正是帮青少年走出迷茫的最好指引。



《寻迹古中国3》
翟德芳 著
上海三联书店
本书是作者在江浙沪皖二十余天考古实地探访的成果，涵盖徐州狮子山楚王陵、蚌埠双墩遗址、良渚遗址、河姆渡遗址等众多古文化遗迹，串联起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文明脉络。作者以考古科班功底与出版人视角，将分散的考古发现转化为可读的文化图景，既揭秘遗迹背后的历史密码，又呈现长三角“山清水秀，人文荟萃”的底蕴，为读者打开一扇理解中华早期文明多元面貌与深厚内涵的窗口。



《机器人人文：关于机器人的想象、叙事与伦理》
程林 著
商务印书馆
我们已然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或机器人时代，思考人机关系是这个时代的命题。从人文角度对“机器人”这一科技人文概念进行研究，可以呈现机器人在科技与工程学之外的另一重要面向，而这一面向对思索“人”之何为提供了别样启示。思考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不仅要立足当下，也应该追本溯源，考察不同的文化。本书不仅能够参与时代讨论，也可以为相关讨论提供更扎实的学术基础。



（□记者 蔡可心 整理）

我与书的故事

每一次翻阅，都是洗礼

□ 杨兆宏

多年前，我无意中走进了一家书店，在角落里看到一本书，封面上写着大大的“鬼雨”两个字，书名吸引了我，细看发现这是余光中先生的散文集。

那漂亮的封面，散发墨香的纸张，让人爱不释手。文章很深邃，我逐字逐句阅读，还用红笔把好的词句勾画出来，在旁边写上批语。我用了几乎半个学期的时间，终于把这本《鬼雨》艰难地“啃”完了。

《鬼雨》让我明白原来读书也这么艰难，仿佛在爬一座很高的山，有时想放弃，有时又会心一笑。我在作文和日记里开始肤浅地模仿，作文一次次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，在学校的宣传栏里张贴。我喜欢上了文学，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人人羡慕的文艺青年，文字变成铅字，被人们捧在手里阅读。

再读《鬼雨》，是在大学期间，这次阅读让我有了更为理性和深刻的感受。余光中像一位文字“魔术师”，擅长以浓墨重彩描绘和渲染大自然的色彩。受《鬼雨》启发，我这样写雨声：深夜，隔窗听雨，唧唧切切，似是情人夜话，又似牛啃青草或蚕噬桑叶，轻轻地搔动耳膜，让人欲听不能，欲罢不忍。而在我的家乡豫南皖西，夜间常伴雨声惊醒。即便是两三点山前雨，也非造出个声势不可。倘说南方雨为芭蕉雨、荷花雨，小桥流水，呢呢喃喃，细腻柔情，宛若处子，则北方雨便是梧桐雨、枫叶雨，铁马兵戈，粗犷豪放，恰似金刚。

我像一个淘金者，不知疲倦地在《鬼雨》里淘着金光闪闪的金粒，滋养我稚嫩干涩的笔触。

2001年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《鬼雨》作为写作的对象，将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《在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的璀璨之丹——谈余光中散文的艺术特色》，我开篇这样写：宣称“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”的余光中，是台湾文坛上一位技艺超群的“魔术师”。余光中以诗著名，当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作为诗人的余光中所构建的诗歌大厦时，视野常常被其光晕遮挡，反而看不到，或者说没有更清晰地看到作为散文家的余光中巧布文字方阵的本领。余光中的散文，想象丰富，情感深厚，风格华美，明快幽默，兼擅感性与管理……

论文顺利通过答辩，获得优秀等次。
多年来，《鬼雨》见证了我从懵懂走向成熟，从模仿走向创造，从读者走向作者的历程。它伴我走过漫长的求学之路，陪我度过无数个伏案写作的夜晚，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：最初是好奇，然后是启蒙，最后是滋养。每一次重读，都是一次重逢；每一次翻阅，都是一次洗礼。

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？请用千字左右，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知的故事。欢迎来稿。
投稿邮箱：dazhongribawt@163.com



藏书楼里的文脉传承

成帝时，刘歆等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国家藏书总目录《七略》，此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。

三国到隋唐，五代，是中国藏书楼的发展时期。宋代，中国藏书楼进入繁荣时期，至清代时，乃是中国藏书楼发展的鼎盛时期。鸦片战争后，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变化：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，使得很多藏书楼难以以为继，晚清四大藏书楼的珍藏陆续散出，但这个阶段也孕育出了公共图书馆的概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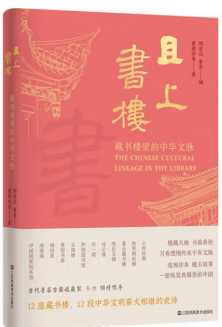
起初的公共图书馆仍是私人属性，比如满族人国英在京建造了共读楼，其认为：“其所以不自秘者，诚念子孙未必能读，即使能读，亦何妨与人共读，成己成人，无二道也。”

共读楼于光绪七年（1881）对外开放，有专门的管理机构，此后出现了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，此楼创建的宗旨一为存古，二为开新。《古越藏书楼章程》中对此宗旨作出如下解释：“学问必求贯通，何谓之贯通？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。往者士夫之弊，在详古略今；现在士夫之弊，渐趋于尚今蔑古。其实不读古籍，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；不读今籍，无以启借鉴交通之途径。故本楼特阐明此旨，务归平等，而杜偏狭之弊。”

1904年，湖南图书馆正式建立，此为为中国图书馆史上第一家以“图书馆”正式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机构。1908年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、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建黑龙江建设图书馆。

1912年8月，京师图书馆正式开馆，此馆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，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进入全新时期。2022年7月23日，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，使得中华典籍的珍藏正式迈入国家战略。历代藏书家以及政府机构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收藏和保护典籍？明丘潜任修金匱石室的奏书中写道：“惟所谓经籍图书者，乃万年百世之事，是皆自古圣帝王、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，道德文章之懿，行义事功之大，建置议论之详，今世赖以知古，后世赖以知今者也。”

图书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在缺乏其他传承媒体的状态下，图书几乎是传承文明的唯一手段，典籍不灭，文化就不灭，这就是藏书家的意义所在。中国古代早有了这样的概念，古人云：耕读传家，诗书继世。他们强调与其留给子孙大量的田地家产，不如传承书籍更有价值。这是历代藏书家共有的概念。



□ 韦力

要讲藏书楼，首先要讲藏书家，要讲藏书家，则必要提藏书的起源。早在周朝，朝廷就有了名叫“藏室”的藏书处，各诸侯亦有藏书，其藏书处为“盟府”或者“故府”。周室与各诸侯均设有专门史官来管理典籍。《史记》称（老子）为“周守藏室之史也。”

自汉之后，中国历代都有专门的藏书机构，汉高祖刘邦命萧何接管秦王朝所遗书籍，同时修建天禄阁、麒麟阁等专门的藏书处。汉



1943年9月9日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（右）在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投降书